

《拼桌》： “拼桌吃饭”中的都市青年生活哲学

○ 张馨月

青年导演吴靖自编自导的上海都市电影《拼桌》，借助一道道浓油赤酱的上海本帮菜，以美食为媒介讲述了新一代上海人的社交关系与生活图景。影片中，江疏影饰演的图书编辑张嘉怡和王传君饰演的“码农”陆拾谷因拼桌意外成为“饭搭子”，在追寻美食的过程中，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情感与生活，并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文化混搭： 新旧交融的上海都市图景

《拼桌》将上海作为故事背景，不仅继承了海派电影讲述市民生活、强调人文气息与小资情调的传统，而且融入当代年轻人中盛行的“搭子文化”和偏好疏离人际关系的“淡人文化”等青年文化，以轻喜剧的叙事风格，展现了新一代上海人的地域美食与本土人情。

体现在人物塑造上，张嘉怡与陆拾谷是两个典型的“老派”上海年轻人。他们注重吃得讲究、偏爱上海老味，因都不愿在午休时间“对付一口”，于是在一家本帮菜馆意外相识。然而，他们却只将彼此当作“饭搭子”，固守交往边界，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人际关系。影片以此折射出当下加速变迁的都市文化图景，探讨了一种既轻盈又富有烟火气的崭新都市人际关系与生活方式。

舌尖春秋： 味觉情感的影像书写

食物是《拼桌》里最重要的叙事媒介。在片中，不同的地域美食往往携带



着个体独特的生命印记，作为一种“可被品尝”的记忆载体存在。如承载着外婆爱情记忆的湖南辣子，或是东北姑娘三三在异乡才爱上的铁锅炖大鹅。当他品味这些美食时，也在不知不觉间走进了对方的生命中。

一方面，不同的饮食偏好是主体间差异的直观体现，诉说着当代社会中个体强烈的自我意愿。当嘉怡的男友叶凡选择预制快餐而非她亲手下的家常小面时，二人的感情裂缝已初见端倪。同样，相亲局上偏要用“韩式吃法”吃日式烤肉的相亲对象，也注定与面对食物格外讲究的拾谷不是一路人。另一方面，食物作为一种沟通媒介，尝试他人的饮食习惯能够潜移默化地连接起“原子化”的个体，促进彼此的接纳与理解。作家林桐原本因出版观念不合拒绝了嘉怡，却被她送来的辣椒酱中熟悉的味道

打动，同意合作。拾谷也在帮助嘉怡寻找辣椒豆的过程中找回童年熟悉的小吃店，在味蕾的作用下放下怨恨，最终选择理解父亲。

生活本味： 精致务实的海派生活哲学

《拼桌》借助人与食物的关系讲述了人与生活的关系，延伸了一种精致与务实并存的海派生活哲学，更立足于现状，探讨了都市青年在追逐自我升级与功利化成长的当代社会中，如何不被繁华表象裹挟，回归本心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正如作家程乃珊在《上海 Taste》一书中所说：“老上海对精致生活的追求，人所皆知。所谓精致，讲求的是心思，与花钱多少无关。”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中，光鲜的物质外壳往往遮蔽了个体内在的声音。只有当人们静下心来，像品尝美食一样品味甚至挑剔生活给出的选择时，方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滋味。因此，张嘉怡面对不合适的订婚钻戒时幡然醒悟，选择与条件优渥的男友分手。陆拾谷也放弃了高薪却压抑的程序员工作，遵从热爱开了一家私房餐馆，展现出都市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自我选择。

尽管《拼桌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地缘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刻板想象，导致社会深度不足，但影片却通过“饭搭子”这一典型的青年文化现象，折射出新旧交融下的上海都市风貌，并通过食物这一与味道相伴的记忆载体，让身处喧嚣都市生活中的年轻人重拾对生活滋味的体验，完成对时代个体的治愈。

影视热评

2026年5月11日 星期一 主编:周星
责编:倪尧 美编:庞红梅 校对:梅莹 金苗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5

文化艺术报

《阳光女子合唱团》： 女性情谊的动人书写

○ 吴英华

杀死，入狱后诞下患有眼疾的女儿；为孩子留存温暖的母亲记忆，她执意组建合唱团，这份母爱饱含心酸与无奈。与之对照，是自幼被母亲抛弃的宥芯。面对只为利益的母亲，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与自我怀疑，“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母亲？”这一质问，表达了被伤害的女儿对母女情感的复杂感受。而玉英奶奶一生背负着未能尽到母亲责任的愧疚，始终无法与过往和解。影片进一步打破血缘边界，将母女情谊延伸至非血缘的情感认同。在监舍中，玉英将对女儿的亏欠，化作了为几位年轻女子的照顾与守护。看到李惠贞为孩子组建合唱团，她放下心结站上舞台，既成全了母亲的心愿，也完成了与当年不完美自己的和解。这种“不是母女胜似母女”的羁绊，让女性之间的理解、陪伴与救赎获得了深厚的表达。

影片不只刻画受刑女性之间的温情，还呈现了管理者与服刑者之间复杂温暖的关系。方科长起初严肃刻板，按章程办事，几乎不近人情，但当合唱团遭遇强迫脱衣搜身时，她坚定站出来维护她们的尊严；外出时，她又安排托育中心的孩子到场，以合规的方式悄悄圆了李惠贞见女儿一面的心愿。主管育雯也在程序允许下对李惠贞母女给予关照，一句“因为你有我没有的勇气”，表达的是女性之间基于理解的欣赏与认可。她们是制度的执行者，必须守住纪律的底线，但她们也是心存善意的普通人，愿意在规则允许下给予一点微光。这种守底线而不失温度的人物塑造，以及在规则与温情之间的平衡，都是这部电影非常动人的所在。

电影《阳光女子合唱团》，改编自韩国《和声》，由刘蔚然监制、林孝谦执导、吕安弦编剧，陈意涵、翁倩玉、钟欣凌等主演。影片将镜头对准女子监狱这一特殊空间，以朴实细腻的叙事笔触，刻画了女性服刑人员之间的相互扶持、母女情感的复杂状态，以及制度规则与温情温暖的微妙平衡，含蓄而真切，动人而有力量。

影片以含蓄的救赎书写，将女性之间的相互支撑与精神疗愈自然融入合唱之中。一方面，合唱团为她们构筑了日常共处与磨合的空间。这群封闭戒备的女性服刑人员，在合唱排练中展开互动，在日复一日的磨合里，她们慢慢卸下心理防线，袒露真实而脆弱的一面。同时，她们的情感也在轻松温暖的日常点滴中沉淀，最终成为彼此坚实的精神依靠。另一方面，合唱也被赋予了超越艺术的疗愈意义。对这群身处狱中的女性而言，唱歌最初只是谋求减刑的功利性手段，但在合唱排练中，它渐渐变成一种倾诉思念、释放情绪、与自我及过往和解的方式，唱歌成为她们实现自我救赎的途径，艺术的疗愈力量也在此过程中充分显现。高墙之内，歌声如同穿透阴霾的阳光，让她们仍能拥有对爱与美好的向往，这也构成了影片最动人的价值表达。

母女关系是《阳光女子合唱团》的情感核心，也是影片最见功力之处。影片没有塑造完美的母亲形象，而是直面母爱本身的笨拙、遗憾与身不由己，并将这一主题融入多组关系的书写之中。血缘层面的母女关系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形态。李惠贞为保护腹中胎儿，与家暴丈夫冲突中失手将其



《长夜将尽》： 老龄化社会的镜像文本

○ 张一宁

作为王通执导、陈晓志监制并跨界主演、万茜领衔主演的现实主义犯罪片，《长夜将尽》以真实社会事件为基底，将犯罪类型外壳与老龄化社会议题融合，通过三重重叠交织的叙事架构和富有隐喻性的视听语言，构建出一个人性挣扎、家庭伦理与时代困境的镜像文本。

叙事策略：类型融合与 “人兽同困”的寓言建构

《长夜将尽》没有沿用犯罪片“善恶对决”的传统模式，而是在罪案类型中嵌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议题。影片以叶晓霖（万茜饰）伪装保姆进入马家为起点。她要照顾的对象，是马德勇（陈晓志饰）失智的父亲。马德勇自幼因小儿麻痹被父亲嫌弃，如今姐姐和弟弟把照护责任都推给他一人。他勉为其难地承担起这份责任，同时还在动物园里喂养一只年迈的狮子。

笼中蹒跚的老狮与病榻上失能的老人，在影片中形成互文。马德勇既无法下定决心让年迈的狮子走向生命终点，也没有勇气直面父亲带来的照护重负。叶晓霖的出现，替他做了他不敢做的事——她以“解脱”之名，结束了老人的生命。这并非她第一次作案，在此之前，她已多次以保姆身份接近失能老人，以同样触犯法律的方式夺走他们的生命。在人物塑造上，这一设定赋予角色复杂的悲剧色彩，但必须明确的是，无论动机为何，这种僭越法律与伦理底线的行为都不能被合理化。

警察周平（屈楚萧饰）介入调查后，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但马德勇得知后并未报警，反而找到叶晓霖，把父亲留下的钱塞给她，希望她离开。影片结尾，叶晓霖被带走时，马德勇将一把刀插进她的胸口。这一刀意味着什么？或许是他长期压抑后的极端爆发，是他以叶晓霖的方式对叶晓霖实施的感情复杂的审

判。然而，以私刑代替法律裁决是明确的犯罪，当一个人试图用自己的标准去“审判”他人之恶时，他自身也跌入了恶的深渊。影片用“人兽同困”的寓言，在罪案故事之外留下了回味的空间。

人物塑造：人性复杂的 立体呈现与伦理困境的具象化

《长夜将尽》没有采用非黑即白的人物塑造方式，而是通过三个具有复杂性的人物，将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伦理困境具体呈现出来。

叶晓霖是影片中最具矛盾性的角色。她是事实上的连环杀手，多次以保姆身份接近失能老人并结束他们的生命；但她同时也是一个被命运反复碾轧的人，善意在极端处境中走向了扭曲。这种“恶中有善、善中有恶”的设定，让角色跳出了传统犯罪片对凶手的扁平化处理。马德勇则呈现出另一种困境。他是家庭中被忽视的那个孩子，却要独自承担照护失智父亲的责任，对父亲既有积年怨恨，又因血缘牵绊而于心不忍，这种矛盾撕扯让他陷入深深的无力。叶晓霖替他做了他不敢做的事之后，他并未报警，反而试图用钱让她离开，这种矛盾的选择，折射出子女在养老压力下的无奈与挣扎。周平作为警察，需要维护法律的严肃性；作为同样有长辈需要照护的普通人，他又能够体察失能老人家属的艰难。他始终在法律理性与人性温度之间摇摆，把伦理抉择的难题留给了观众。

时代镜像：老龄化社会的 现实叩问与人文关怀

在主题上，影片借犯罪故事的外壳，完成了对老龄化社会的深刻叩问，成为当代社会的镜像文本。

影片聚焦于老龄化社会中的三大核心困境：一是家庭亲情的缺席，当子



女想尽孝却力不从心，老人不得不将生命托付给陌生人，信任便可能沦为恶意算计的入口；二是养老支持系统的失效，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，而社会养老体系尚未完善，人性中的自私与恶意有了滋生的土壤；三是伦理边界的模糊，当“为老人解脱”成为恶行的借口，当法律与人性发生冲突，人们面临着艰难的伦理抉择，折射出当代社会伦理体系的复杂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影片并没有简单地谴责恶行、美化无奈，也没有给出解决养老困境的标准答案，而是以冷静克制的叙事姿态，展现出多方交织的道德复杂性。老人的孤独恐惧、子女的无奈愧疚、凶手的绝望挣扎，都是这个时代的症候，也是每个人可能面临的未来。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影片的现实观照更加客观、深刻，也让观众在反思中，重新思考家庭责任、生命尊严与人性底线的内涵。

长夜或许漫长，但人性中的微光从未熄灭。老龄化社会的考题已摆在每个人面前，如何让长者有尊严地度过晚年，不仅是一部影片的叩问，还应由全社会共同作答。